

· 人文游踪 ·

顺化散记(上)

□ 葛剑雄

当一位美国朋友邀我去越南的“HUE”参加国际会议时，我对会议的地点竟一无所知。他解释说，这是越南古都，在中部。“莫非是顺化？”我想，但顺化怎么会用这几个字母呢？后来将英文地图与中文地图一对照，发现果然是顺化，这使我对越南汉字的译音产生了很大的疑惑。拿到机票，见由泰国曼谷进入越南的机场是DANANG，以为汉字应该用“大南”或“达南”一类，可是地图上在顺化附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的地名。反正我去越南是讲英语，所以就“DANANG”称呼吧！在越南时听说这里原来是重要的美军基地，回国后在地图上对照，才知道就是越战时大名鼎鼎的岘港。记得那时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能见到越南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消息，对越南的地名是相当熟悉的。如今对着一张没有一个汉字的越南地图，除了河内、胡志明市等少数猜也猜得出的地名，对其他地名竟毫无办法——无论是摹仿越南字母的发音，还是根据英文读音，都无法与原来记得的汉字地名挂上钩，显然它们的越南文读音与汉字读音相去甚远。记得学日语时，面对一个个熟悉的汉字地名也曾一筹莫展，只能一个个记。但日文中的地名一般都写汉字，就是读不出或读不对音还不会搞错。如今越南的地名已完全不用汉字，像我们这些自以为知道不少越南地名的人比美国人还麻烦，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只记地名的读音，我们却还得将原来记得的汉字地名与它们真正的读音一一对应。

越南,是不是早已离开了中国文化圈?

泰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岘港机场,没有登机桥,也没有摆渡车,不远处就是候机楼。进门就见到两个办入境手续的柜台,大概我是唯一持免签证的中国因公护照的旅客,所以第一个办完入境手续。这时我才发现,提取行李的地方是在入境柜台里面,所以必须先取行李再入境,而不是像一般的机场那样先入境再提行李,或许是这个机场的候机室实在太小了。我不得不向检查人员说明,重新“出境”,然后第二次入境。

与我乘同一班机来的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和澳洲的六位与会者,等我们这些来自东半球、西半球、北半球、南半球的人到全,还不见主人的踪影。乘客很快散尽,候机室的门纷纷关上,据说这个国际机场每星期才有往返泰国的三四个航班,此时就像中国农村一个长途汽车站。见这一帮外国人还没有走,出租车司机开始了车轮大战,开出的价一个比一个优惠,当然都是以美元算的。教科文组织的P博士与悉尼大学的I教授带着手机,不停地拨号,不知是因为他们的手机不能在越南入网,还是讯号不灵,总之毫无结果。我无事可做,极目四望,公路旁寥寥几幢旧房,除了并排飘扬着的越南金星国旗和镰刀斧头党旗,以及近处墙上以越南文写着的大幅标语,似乎就是在中国南方的某个县城郊外。

一个多小时后,一辆面包车停在我们面前,司机拿出一张纸,原来正是旅馆来接我们的车。七个人加行李,车厢里塞得满满的,连驾驶座后面的横档上也坐了两人,与坐在第一排椅子上的人几乎随时可以接吻。但开车不到5分钟,司机戛然刹车,又招呼二位男子上车,一位挤着坐在横档上,另一位就塞在司机旁的座位里。越南之行这样的开局和破旧的公路、简陋的建筑使我怀疑自己的期望值是否太高,幸而不久公路就拐到了海边,并且沿着山坡逐渐升高,岘港湾秀丽的景色展现在眼前。当汽车终于爬上山颠开始下滑时,我们几乎都嫌司机开得太快,因为多数人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已经对准了窗外。

进入顺化市区不久,汽车驶过横跨香河的一座大桥。刚转进一条狭窄的马路,就见到路尽头是一座仅够一辆汽车通行的桥,正对

着一座残破的城楼。过桥时向左右望去,长满水草浮萍的护城河后面是不高的城墙,将旧城紧紧围住,左侧隐约见到另一座城门,再远处的城墙上飘着一面巨大的金星红旗,与暗淡衰败的城墙和几近淤塞的河水适成对比。

驶进城门后过了三四个街区,道旁挂着“PHANNOI HOTEL”的招牌,折进小路,就到了我们住的旅馆。这是一座带庭院的法式建筑,布置虽不豪华,但整洁舒适,园内还有一个小游泳池,价格适中,又离宫城很近,所以是多数外国游人的首选。后来才知道,PHANNOI的汉字就是“城内”,可惜旧城之内几乎见不到汉字了。

尽管宫城近在咫尺,我还是决定留着以后从容参观,于是沿着刚才来的路步出旧城。从远处远见一座中式建筑,来到香河边,果然见到一座面水而建的亭子。这座上檐四角、下檐八角亭子是混凝土结构,显然已经过改建,但亭额上还题着“商舶”两个大字。正对着亭子的路边树着四根砖砌水泥面的门柱,柱上写着两副门联,中间一副是:“柱树御屏高,万古纲常特立。门依京阙近,四方视听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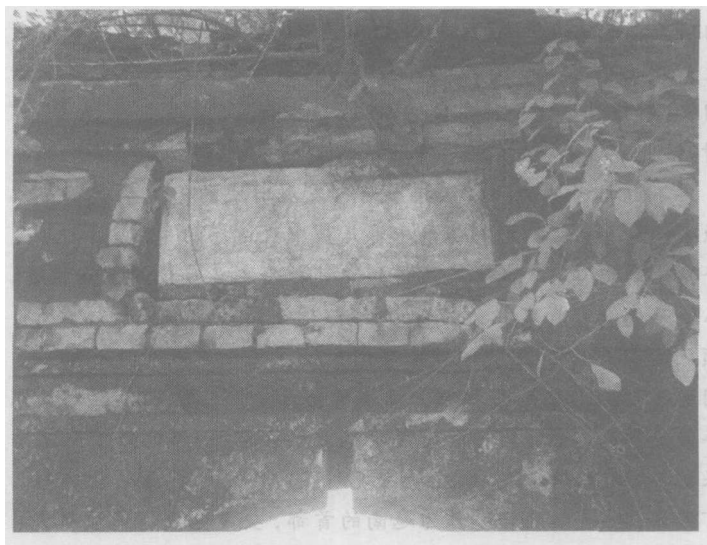
在我往河边走去时，一位越南青年就远远地跟着。等我走近亭子时，他就用英语与我交谈：“你知道吗？这个亭子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当时周围有九个国王，他们集中到顺化来，这是国王们钓鱼的地方。”我说：“你才几岁？你怎么知道的？”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爸告诉我的。”“三百年前的事，你爸也不见得能知道，”我指着亭子上“商旅”两字问他，“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看来根本不知道。但他马上说：“你是从中国来的？我们这里还有宝塔，那可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我可以带你去，车就停在路边。”原来他跟着我的目的，是为了拉我坐他的三轮车。

回到旧城里，我沿着棋盘样的街道和小巷漫步。这是一个真正的旧城，基本都是一二层的建筑，很少见到新房，没有工厂，也没有太大的商店，除了满街的摩托车、自行车和三轮车外，难得见到一辆汽车驶过。不知不觉间已经穿过城区，来到另一边的城门，一样的门楼，一样的护城河，一样的桥，一样的残破和衰败。在以后几天，我几乎绕了顺化旧城一周，不能不感叹旧城的完整——除了旧，它还缺什么呢？而在我们国内，一些有名的“旧城”、“古镇”、“古村”，以至“古庙”、“古迹”，都有不断变换的新，却独缺真正的旧。

不过与当地的年轻人接触后，发现旧城的保留至少不是他们原来的愿望。他们抱怨越南中部是被中央遗忘的角落，顺化就是这个角落的中心。中部既不能得到北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投资，又不能享受南部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连上网的速度也慢得出奇。但顺化故宫、旧城、王陵被整体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和日益增多的外国游客使他们看到了希望，据说英语和电脑已经成为当地知识青年最热门的追求。当地的官员也向我们介绍，旧城已经受到完全的保护，顺化的新建筑、新发展都规划在旧城之外。历史就是那么不可思议，要是顺化始终作为越南的首都，要是它没有毁于战火，要是它在统一后没有被中央政府“遗忘”，要是当地的自由经济在它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就得到发展，还会有今天的顺化旧城吗？可是我们同样有理由担心，当旧城里的居民富裕到要拆旧屋建新房时，要买私人汽车时，要离开这座旧城时，今天的旧城还能保

存吗？两天后，当我亲眼见到故宫的管理人员骑着摩托车直驶上走廊，停在殿内时，我的担心更增加了，以至忍不住向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提了意见。

尽管顺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但今天的旧城只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产物，甚至连法国殖民统治前的遗物也所剩无几了。无论是民居还是公共建筑，都是越南化了的法式，连新建的也不例外。无论是商店的招牌，还是商业广告、政治标语，都是罗马字母化的越南文，或者同时加上英文和法文。在表面上，这座旧城与中国文化已经找不到共同点和连接点。在昏暗的夕阳中，我在一座居民杂院前见到了一个残破的门楼，在青苔绿叶间，刻在门额上的“钦天监衙门”五个朱红阳文楷书赫然在目。很快一群居民好奇地围了过来，有人还问我为什么要拍这个门楼的照片，显然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竟是当年的国家天文台。



第二天晚上，我们应邀到梅先生家晚餐。梅先生是一位退休的文化局官员，目前个人经营文化产业。他写过好几本介绍越南文化的书，其中引述了不少用中文写的诗歌和文章，他都一一翻译为越

南文。梅先生的家在一个幽静的小道旁,宽敞的院子里花木繁茂。走进这幢法式平房的正厅,见到的却是典型的越南传统文化,中堂后侧是一个巨大的神龛,正面墙上挂着楹联和字画,厅堂内放置着整套红木家具,文房四宝一应俱全。从楹联内容看,主人既是阮朝的文职官员,又是成功的商人,可称地方名流。正想问梅先生宅主人的身份,他已经主动告诉我们,此宅建于上世纪20年代末,主人确是阮朝和南越政权的官员,越南统一时已远走美国,现在旧金山。不少人曾与主人联系,想购买这座住宅,主人都没有同意。在了解梅先生的情况后,主人将此宅交给他保管和使用。看来主人并不缺钱,而是想将住宅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梅先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自然使他成为合适的保管人。我向几位西方客人解释楹联的内容,能听懂英语的梅先生点头称是,但我问他能不能用中文朗读时,他连连摇头。梅先生的英语表达能力还很差,关键时刻只能用中文笔谈,我发现他的汉字写得很好。这种现象在越南中老年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来自胡志明市大学的高先生是金庸小说的翻译者,可是我与他交谈也相当困难,因为他只能听简单的中文,说几个中文单词。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感慨,中国文化离越南的知识分子也已经如此遥远!

当五天后我离开顺化,沿一号公路南下时,我已经在这座越南古都找到了更多中国文化的痕迹。马年将临,商店里以马为主题的图画、照片、年历随处可见,有的还题着“骏马飞奔”、“前程万里”、“八骏图”,有的是直接从中国进口的。由于中国的农历仍在越南流行,所以越南人同样在迎接马年,当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不认识画上的汉字,也不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了。在一家刚办完喜事的餐馆里,我看到墙上依然挂着大红的双喜字,尽管这双喜字似乎缺了一笔,说明它还是越南人认同的喜庆符号。更普遍的现象却是在墓葬,顺化城周围的王陵自不必说,完全是中国帝王陵墓的小型化和越南化,就是一般民众的坟墓,无论贫富,几乎都写着或刻着一个大大的“福”字。(待续)



越南 顺化故宫

详见本期及下期《顺化散记》

摄影 葛剑雄